

近年来瞿秋白研究综述

朱敏彦

瞿秋白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瞿秋白的研究历来是中共党史人物研究的重要课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他的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无论是研究视野的拓宽,研究课题的深化,还是研究队伍的扩展、研究成果的纷呈,都可谓盛况空前。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发表的研究文章达数百篇之多,新出版的专著也有六、七部。这些研究成果反映了瞿秋白研究已达到一个新水平。现将近年来瞿秋白研究的主要成果作一综述。

一、基本评价问题

在 1955 年 6 月瞿秋白就义 20 周年时,陆定一曾代表党中央赞扬他是中国共产党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和宣传家,中国无产阶级的无限忠诚的战士。1985 年 6 月,在瞿秋白就义 50 周年纪念会上,杨尚昆代表党中央,再次肯定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的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①

在党内已故的领导人中,迄今为止只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董必武、任弼时、瞿秋白、张闻天等人被赋予“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研究者认为,瞿秋白受这一称号是当之无愧的。

二、早年的基础理论研究

这是近年来瞿秋白研究中所涉及的新内容,主要探讨了两个问题:

(一) 早年基础理论研究的成就

研究者认为主要表现在:1. 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作了较多方面的研究,具有初步的系统性;2. 他的哲学著作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第一次较完整地为中国思想界所知,相当广泛地涉及了有关哲学问题,有些论述十分精辟;3. 他将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运用于社会科学的宏观研究;4. 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社会学研究。其论著《现代社会学》、《世界的社会改造与共产国际》等构筑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第一个理论体系,他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最早创建者;5. 他把马克思主义引入文化学研究,在中国真正开辟了科学的文化学园地。

(二) 早期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研究者认为瞿秋白早期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由书本到实际的过程。这一过程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五四前后,瞿秋白主要通过研读介绍社会主义的著作,主要是倍倍尔的《社会之社会化》和《妇女与社会主义》等认识了社会主义,当时掺杂着许多非科学的成份,如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和将社会主义社会理想化。社会主义思想在他的世界观中还只是刚刚有所萌芽,还没有从空想上升为科学。第二阶段是 1920 年秋至 1923 年初在苏俄访问期间,对苏俄社会主义现实生活进行考察和研究,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理解。这一时期,他对

^① 杨尚昆:《在瞿秋白就义五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85 年 6 月 19 日。

社会主义的认识在两个方面有所突破和提高。一是他开始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对社会主义作深入的探讨,而不是如以往那样仅仅停留在书本的了解和理想的追求上;二是开始把社会主义的实现同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紧密地联系起来。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于1922年2月在莫斯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三、早期思想的转变

(一)转变的时间。多数研究者认为,从1920年初到1923年初是瞿秋白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转变的时期,上限应划在1920年春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理由是:1. 五四以前,当时的社会环境使他的思想充满矛盾,既有爱国奋起的热情,又有消沉、“厌世”、“避世”的思想。五四运动爆发后,反帝反封建革命浪潮冲开了束缚他思想的罗网,思想上前进了一大步,但还限于以建立民主、民治、民本国家的民主主义思想范围;2. 1920年初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同年3月参加了李大钊领导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始在《新社会》上介绍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和国家学说,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3. 同年10月赴苏俄考察,1923年初回国。在此期间他热情歌颂俄国十月革命,积极宣传社会主义,逐步树立起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的观点,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也有少数研究者认为,其转变的上限可划在1919年五四运动。理由是:1. 五四以前是他摸索着走向革命民主主义道路的阶段。参加五四运动是他思想发展的第一个转折点。五四运动的巨大影响,使他逐步摆脱了唯心主义哲学和佛学研究所产生的消极厌世思想,从此,他由苦闷、徨走向火热的革命斗争,从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二)早期思想转变的特点

有的研究者指出,瞿秋白早期思想的转变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把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地考察十月革命结合起来;二是把自己世界观的改造和积极参加社会斗争密切结合起来。

四、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历史作用

(一)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作用

研究者认为瞿秋白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积极的促成者、卓越的活动家、坚定的捍卫者。其主要作用可归为三个方面:第一,参与了中国共产党国共合作决策的制定;第二,积极投身于国共合作的实际活动;第三,坚决与国民党右派反共分裂活动进行斗争,捍卫了革命统一战线。

(二)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批判

研究者们系统地论述了这一问题,一致认为瞿秋白的功绩在于:首先,他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放弃了无产阶级领导的错误;其次,他批判了右倾投降主义在农民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再次,他批判了右倾投降主义放弃无产阶级对武装斗争领导权的错误。

五、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作用及评价

(一)在“八七”会议中的地位

研究者认为“八七”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个伟大转折点,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而“八七”会议的顺利召开和它所起的历史作用,是同瞿秋白为召开和开好这一会议所作出的努力分不开的。这是因为瞿秋白是参与决策和具体筹划“八七”会议的主要成员之一,是会议的实际领导者和主持者。瞿秋白主持召开“八七”会议,是他一生中最光辉的业绩之一。

有的研究者还就“八七”会议为什么由瞿秋白主持召开及推选他为临时中央政治局负责人的原因进行了探讨,认为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可以说是非瞿莫属。理由是:1. 建党初期,他负责党中央的理论宣传工作,对宣传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政治主张,作出了显著的成绩;2. 大革命时期,他的理论水平较高,革命活动也很多,无论是促进国共合作,还是批判国民党新老右派的反动谬论,他都是旗帜鲜明;3. 在革命发展的关键时刻,他就革命的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展开斗争,赢得了广大党员的信赖,也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4. 他是五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常委,在党内有相当高的威信。

(二)关于“左”倾盲动主义错误

瞿秋白是否犯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对此问题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在坚持“八七”会议的正确方针的同时,也实行了“八七”会议开始的一些“左”倾政策,并使“左”倾错误逐渐发展起来,到十一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时,便形成为政治上的盲动主义和组织上的惩办主义。

另一种观点认为,瞿秋白的错误,是在革命处于重要转折关头,对革命道路进行探索过程中出现的错误,虽然有

“左”的偏向,但尚不能简单地称之为“左”倾盲动主义。理由是:1.大革命失败后,我党并不是在革命潮流低落时蛮干盲动,而是在“领导革命潮流的发展”中有急躁情绪;2.瞿秋白没有提出系统的“左”倾理论,而是在纠正右倾机会主义出现的偏差;3.瞿秋白没有背离“八七”会议的总方针,而是在坚持执行总方针中产生了失误。有的研究者还用大量史料,详细论证了以往党史论著中作为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代表事例——江南农民大暴动,并不是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主观炮制的产物,而是江南广大农民孕育着的反抗因素的必然爆发,是我党贯彻“八七”会议精神的结果。有的文章还举出史实,说明瞿秋白曾阻止过一些盲动做法。

关于错误的责任问题,研究者也有两种相左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主要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负责。他不仅是盲动主义的创造者,而且是强迫推行者,因此,瞿秋白不负主要责任。

另一种观点认为,这次“左”倾错误是由革命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急性病滋长起来的,是党内“左”倾情绪发展的结果,有其内在的思想和社会根源,这次“左”倾错误是通过党的“八七”会议和十一月中央扩大会议自觉地形成的,我们党自己应负主要责任。而瞿秋白正是这一错误方针的制订者和主要推行者之一,又是当时党的主要负责人,理应负主要责任,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

(三)关于与第三国际某些人的分歧与斗争问题

近年来,一些文章指出,瞿秋白是在第三国际和列宁关怀下成长起来的。他贯彻了第三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正确主张,但与第三国际某些人的错误主张有分歧,有斗争,主要集中在“关于‘第三时期’的理论”;“关于中国革命的道路”;“关于对中国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评价”;“关于江浙同乡会”;“关于对中国富农的政策”;“关于中共党内倾向斗争”;“关于中间营垒的评价”;“关于对白区职工运动的方针策略”等问题上有分歧。由于瞿秋白在这些问题上坚持了正确观点,因而受到第三国际米夫等人的打击。

六、对中国革命理论的贡献

研究者们一致认为,瞿秋白对中国革命理论的贡献是多方面,有的研究者将其归为这几个方面:1.一贯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同时强调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从实际出发,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2.首先提出和阐明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领导权的思想;3.很早就重视农民和土地问题,认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也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4.很早就重视武装斗争和革命战争,强调暴力革命的重要性。对此归纳,研究者们普遍赞同,但有些问题仍有争论。

(一)是否在党内首次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

一种观点认为瞿秋白不是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首倡者。理由是:我国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提出,有一个发展过程,它留下了许多同志探索的足迹。在这一过程中,最先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概念是高君宇,最先科学阐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概念是邓中夏,而全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则是党的四大。

另一种观点认为:瞿秋白是中国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首倡者。理由是:瞿秋白早在1923年6月就指出:“无产阶级在社会关系中,自然处于革命领袖的地位”。比邓中夏早提1年零5个月,比中共四大早1年零7个月,比《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早2年多。同时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应当体现在思想领导、占交椅(组织领导)、争的过程(领导权是争来的),以及如何正确领导这几个方面,对这些问题瞿秋白都首先作了正确回答,另外,承认瞿秋白首次提出,并不等于否定高君宇、邓中夏等在这方面的贡献。

(二)是否在党内最早提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

一种观点认为,1927年瞿秋白及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已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最早全面总结了土地革命初期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理论雏形,初步论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建设问题,是党内最早注意从理论上说明这个重要问题的,而且这一思想还反映在党中央的一系列指示中。其主要依据是这一时期瞿秋白撰写的文章、中共中央的有关文件及其政策主张,尤其是瞿秋白发表在《布尔什维克》1927年第10期上的《武装暴动的问题》一文。

另一种观点与它相左,认为1927年瞿秋白没有提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持此说者首先指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作为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特定的历史过程和内在逻辑结构,它不仅是对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三个方面分别的深刻认识,而且包括对三者的整体、三者的相互关系的深刻认识。按照这样理解,最早形成工农武装割据系统思想的是湘赣边界井冈山根据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这一思想的提出以1928年

《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井冈山的斗争》两文为标志。而瞿秋白在1927年所写的文章、文件中,既没有论证工农武装割据的可能性,也没有系统地总结武装割据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而且他对“红色区域”的地位、作用和意义缺乏正确的认识。他提出的不是根据地的思想,不是积聚革命力量的方法,而是一种暴动思想。当然,瞿秋白对这一思想及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是有贡献的。

(三)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

研究者认为,瞿秋白基于对中国国情的正确认识和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深入研究,在党内最先提出中国革命的新道路。但他提出的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概念与毛泽东总结出的新道路的完整理论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前者是提出了若干的“合理内核”,后者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确定了中国革命发展的民主革命的新道路。

有的研究者针对以往一种观点,即认为瞿秋白为首的党中央盲目照搬照抄俄国革命以城市为中心的模式进行质疑,认为这种观点不符合历史事实。理由是:1. 党领导的武装暴动不同于俄国革命中的中心城市起义,表现为发动暴动的突破点和方式不同,参加暴动的地区和力量不同;2. 党中央对农村根据地是充分肯定和积极指导的;3. 党中央对农村包围城市道路作了有益的探索,在领导各地武装暴动的实践中,提出了建立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

七、对新闻、文艺事业的贡献

(一)对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贡献

研究者一致认为,瞿秋白自1919年至1934年,先后创办、主编、编辑过一系列进步报刊和党报党刊,开创并积累了出版党报党刊的实践经验,对我国现代新闻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主要新闻活动有:五四时期创办了进步刊物《新社会》;1920年10月作为《晨报》和《时事新报》的特派记者前往苏俄采访,写下了《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等集子;1923年初回国后,先后主编中共中央理论机关刊物《新青年》、《前锋》,编辑、主编中共中央第一个政治机关报《向导》;五卅运动中主编党的第一份日报《热血日报》;大革命失败后在国统区主编中共中央理论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1934年到瑞金接任中共在根据地创办的第一个中央级机关报《红色中华》,任社长兼主编。

(二)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贡献

研究者一般认为,瞿秋白在这方面的贡献可归纳为这几个方面:第一,较早地较自觉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文艺现状,探求文学革命运动中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文艺主张;第二,在指导三十年代革命文艺运动的实践中,致力寻求无产阶级文艺创作的原则,其中论述最为系统深刻的是文艺与政治、文艺与人民的关系以及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等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体系已初见雏形;第三,左联作家特别是瞿秋白对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的艰难探索所取得的许多思想成果,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先声。

八、对《多余的话》的真伪评价问题

(一)《多余的话》的真伪问题

研究者普遍认为,仅就现有的《多余的话》的文本来分析,无论从其内容所涉及的瞿秋白个人的历史、思想感情和当时党内的某些情况来看,还是从文字的风格来看,不可能完全出自敌人的伪造,因此,大体可以肯定是瞿秋白所作。但是,在尚未发现他的手迹之前,也不能排除敌人作了某些篡改的可能性。

(二)对《多余的话》的评价问题

研究者在探讨《多余的话》的思想内容和倾向时,则众说纷纭,大致有这几种代表性的观点:

一是“光辉为主说”。认为《多余的话》是一个活生生的内心充满矛盾的、襟怀坦白而又心情复杂的人在临终前所作的自白,它以罕见的自我解剖深刻地表现了瞿秋白的内心世界。因此,光辉是主要的,灰暗是次要的。二是“主要倾向错误说”。认为《多余的话》集中反映出瞿秋白在对待革命、对待自己、对待生和死这些基本问题的认识上的严重错误,情绪和格调消极低沉,是他思想上动摇和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现。显然,其主要倾向是错误的。三是“小疵不掩大雅说”。认为《多余的话》有一定的消极面,其中一些过火的不实事求是的自我否定是王明“左”倾错误造成的,但这是一时错误的話,同他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相比,只是小疵而已,因此,小疵掩盖不了大雅。四是“退却说”。持此说者把《多余的话》与日本的河上肇的《狱中独语》相比,认为两者都是为了赢得个人自由或至少赢得生存而采取的一种无限度的退却。五是“曲折斗争说”。认为《多余的话》,是试图总结我们党领导的革命的经验教训,因在敌人狱中,这种总结只能以被扭曲的形式表现出来。向自己同志揭露党内最大的隐患——王明路线的紧要遗言,是他的最后斗争。